

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

主编·季羨林

执行主编·牛汉 邓九平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歲月文丛

张岱年题



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

主编·季羨林 执行主编·牛汉 邓九平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/季羨林主编. 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0

(岁月文丛)

ISBN 7-5302-0615-X

I. 我… II. 季… III. 纪实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5510 号

岁月文丛

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

WOMEN DOU JINGLI GUO DE RIZI

主编 季羨林 执行主编 牛 汉 邓九平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.375 印张 416 000 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

ISBN 7-5302-0615-X
I·600 定价:24.00 元

卷 首 语

几十年过去了，回忆往昔岁月，依旧历历在目。中国的知识分子，尤其是老年知识分子生经忧患，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政治运动中，被戴上许多离奇荒诞匪夷所思的帽子。磕磕碰碰，道路并不平坦。他们在风浪中经受了磨炼，抱着一种更宽厚、更仁爱的心胸看待生活，他们更愿讲真话。

——季羨林

巴金是个善心的人，他想通过他的笔，把他经历过的那些使他痛心的事，暴露在太阳底下晒晒，杀杀菌，让别人可以不致再受同样的祸害。这番心意令人起敬。

我当然不敢自比巴金。他长我近 10 岁，我永远也追不上他。但毕竟共同经历了三个朝代，而且还同样莫名其妙地，从这至今还没有人能说得明白，怎么会



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这二十年反常岁月里活了过来。正因为有这一点相同，我们之间有了共同语言。这些语言埋在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的心里，很少写成文字。有人不会写，有人不敢写。一有人写了出来，这些人必然感到痛快。痛是难免的，谁没有伤疤？痛得愉快，这些话埋在肚里会发霉，伤人心骨。

——费孝通

用鲁迅的眼睛看旧史，来龙去脉洞若观火；看新史，通向未来的路依稀可辨。

在历史的长途上，个人的恩怨得失自不足道；而血肉换来的经验，却该认真记取。前者宜粗不宜细，后者宜细不宜粗。

——邵燕祥



目 录

伍修权	“文革”亲历记	(1)
李雪峰	我所知道的“文革”发动内情	(30)
张耀祠	毛主席在滴水洞思考什么	(45)
龚育之	《二月提纲》和东湖之行	(48)
附：关于《〈二月提纲〉和东湖之行》一文的两封信		(80)
张承先	“文革”初期的北大工作组	(83)
印红标	“文革”的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	(103)
安建设	十年动乱第一案 ——对“三家村”的批判	(118)
张守仁	《燕山夜话》被批前后 ——我的十年经历	(135)
杨 欣	杨献珍的“哲学罪” ——杨献珍蒙冤二十年纪实	(152)
李 永	“阎王”的十三载冤狱 ——陆定一蒙难纪实	(169)
秦 川	我眼中的“阎王殿”	(184)
穆 欣	新闻界在“文革”初期受到的严重冲击	(204)



李 庄	喜喜忧忧“想不到” ——回忆“文革”前我在《人民日报》工作 的日子	(234)
李 庄	“文革”中“帮文风”给我带血的记忆	(243)
园 丁	《解放军报》变相停刊始末	(252)
何 蜀	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民主党派	(264)
印红标	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武斗	(287)
印红标	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：造反运动 的兴起	(303)
王海光	红卫兵运动始末	(316)
唐少杰	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兴衰	(347)
王友琴	“文革”中的迫害同学：事实与分析	(364)
陶 正	我本随和	(391)
徐友渔	人与事：一段精神历程	(400)
陈凯歌	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——少年凯歌（节录）	(410)
陆星儿	遗留在荒原的故事	(438)
张抗抗	遗失的日记	(457)
赵之荣	插队倭家寨	(467)
胡东放	黑龙江边的一段回忆	(471)
嵇 伟	我的知青梦 ——一梦八年重返上海	(478)
刘小萌	下乡女知识青年婚姻剖析	(484)
刘小萌	“文革”中知识青年的迷惘与觉醒	(498)
王 晨	遇罗克喋血记	(516)
张天来		
公 刘	刑场归来	(540)
金 凤	他，倒在了“两个凡是”的枪口下	(546)

“文革”亲历记

在我国当代历史和我个人的经历中，横亘着一个不可忽略和难以忘怀的阶段，就是被称为十年动乱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。在这十年中，我有七年半时间，即从1967年4月到1974年9月，是在所谓的“牛棚”中度过的，加上我开始受冲击和等待重新工作的时间，前后正好八年，恰巧与我在外交部和中联部工作的时间相等，成为我建国以后的第三个八年——一个极不正常、度日如年的八年。

这场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已经做出了正确的结论；大量的小说、电影和戏剧等文艺作品，也对它做了形象而生动的反映。不过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，这场运动给自己留下的强烈印象，首先是成千上万名革命干部以至普通群众，遭受到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各种方式的残酷迫害。许多老同志、好同志，在这场浩劫中不幸丧失了生命，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全面内战中我能活过来，真算是幸存者。尽管我在这个时期内的经历与别的同志相比，不算最艰难悲惨，但在总的方面是共同的，由于每人所处位置和情况不同，各自的遭遇和感受又是千差万别的。所以我还是把自己这八年的生活记述下来，它对于后人尤其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，也许是有些参考价值的。

风暴骤起

1966年一开始就预示着风暴将临。林彪通过他的那帮“秀才”们大肆鼓吹“突出政治”等谬论，公开与《人民日报》阐述的周总理等领导同志的正确观点“对着干”。江青伙同林彪又搞了个什么“座谈纪要”，造谣惑众地说我国已被“黑线”、“黑帮”“专了政”。康生等又利用某些报刊兴师动众地大批什么“三家村”，叫嚷“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”等等，大有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势。不过我由于一直忙于党的对外联络工作，开始对此并未过分注意，并且以为所谓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无非是文化界的事，同我们是关系不大的，自己又多年来从事国际上的“反修”斗争，在“反修防修”问题上，自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因此对这场运动最初没有思想准备，对它后来的发展及其影响更是没有估计到。

我参加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是从参加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的。会议主要是通过了著名的《五一六通知》，揭发批判了彭真、罗瑞卿、陆定一和杨尚昆等同志的“反党错误”，成立了以康生为顾问、陈伯达为组长、江青和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的“中央文革小组”。林彪在会议中耸人听闻地做了一个杀气腾腾的“政变讲话”。会议期间，毛主席不在北京，是由刘少奇同志主持的。但是身在南方的毛主席，通过康生等人遥控着这次会议，因此会议一开始就是极不平常的。给我印象深刻的首先是康生的表演，正是此人，在会议过程中起了极坏的作用。

会上康生首先抓住一个《二月提纲》问题大做文章。会前中央原有一个以彭真同志为组长，有陆定一、周扬、吴冷西等同志和康生参加的“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”，他们根据当时学

术讨论中的一些问题和情况，向中央提出了一个汇报提纲，就文化革命问题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。文件写成后，曾由彭真同志向毛主席当面汇报过，后来又由中央作为文件向全党下发。康生本来参加了这个文件的研究和拟定工作，但是他察觉到毛主席对此另有想法，并不赞成这个文件，就马上面孔一变，矢口否认他曾参与这个文件的制定工作，并向毛主席谎称这个文件是将他排除在外的。有人查到文件上有他的名字并经他画了圈，他竟说文件送给他时他并没有看，那上面的圈是由秘书代画的。这样的话他到处讲，有一回还专门向我们讲，可是我听了当时就有看法。我想就算你并未参加这个文件的拟定，后来将文件送给你时，你作为五人小组成员，就有审阅的责任，你应该看却没有看，这至少是政治上的失职，也证明别人并没有背着你。你说那文件自己并未圈阅，只由别人代画了圈，实在不能自圆其说，搞的是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的把戏，把别人都当成了白痴。不过康生这样开脱自己、倒打一耙的结果，却使毛主席相信了，他也认为《二月提纲》是彭真“背着”康生搞出的。康生就用这套手法不仅使自己骗取到毛主席的信任，还使彭真等同志受到了诬陷，使原五人小组除康生以外的四个人全被“打倒”，又导致了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改组，造成了严重后果。

所谓《五一六通知》正是在批判了彭真同志“错误”的基础上产生的，因此康生当然地成了这个《通知》的主要草拟人。会前他曾多次飞往杭州面见毛主席，探知他的意图，取得他的宠信。文件在会议上提出时，康生又成了这个文件惟一的阐述者。我记得他在会上对《通知》稿做了逐段逐句的讲解，还借助毛主席的威望来推销自己的一套，说毛主席在哪些地方，做了多少次修改，有过什么指示，自己又是如何领会的，洋洋得意得简直不可一世。

紧接着这次会议，康生又导演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事件。这张最早将矛头直指北京市委的大字报，一度被吹成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，“其意义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”等等。后来康生曾不打自招地说，这张大字报是他派自己的老婆曹轶欧去北大“直接领导”聂元梓等人联名写出的。他得意忘形地说，没有他康生，这张大字报根本不可能出现。事实确是如此，他幕后导演出的这张大字报贴出后，马上又将大字报全文抄送给毛主席，并立即取得了毛主席的支持和赞扬，决定将这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，在报纸上公开发表，结果不仅由此冲击了北京市委，还在全国点起了大火，十年内乱也就这样正式开始了。

“文革”开始阶段，我还在部里抓工作，没有直接卷入运动。对于彭真、杨尚昆等比较熟悉的老同志突然遭到批判，尽管不太想得通，但还是努力地从“积极”方面来理解这场运动。不久我参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。这时“文化大革命”已在全国全面展开了，刘少奇、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被认为犯了“错误”，从主要领导岗位上被拉了下来。而建国以来很少工作、近年内大搞所谓“活学活用”运动的林彪，突然跃升为中央惟一的副主席，中央书记处已不复存在，康生、陈伯达和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王力等人，一下子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。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纲领性文件《十六条》，其中指出，党内许多负责干部对这场运动是“很不理解，很不认真，很不得力”的。我实际上也属于这种情况，但是在整个形势的触动和影响下，特别是看到毛主席亲自写的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，也意识到这次运动非同寻常，但是仍未想到它同自己有什么切身关系。

十一中全会后不久，1966年8月18日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检阅红卫兵，林彪作为他的“亲密战友”也占据了



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心位置。检阅开始以后，许多“革命小将”和“造反战士”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，向毛主席和林彪以及陈伯达、康生等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头面人物一一献上了红卫兵袖章。我不是这些“小将”们心目中的“革命左派”，当然没有资格享受这个“荣誉”，只能看着别人被佩戴上当时十分招人的红袖章。检阅中间休息时，我看到刘少奇同志孤寂地在一旁呆坐着，没有什么人去接近他。我这人有点怪脾气，见别人不大理他，偏要去找他谈谈。我过去同他工作接触不少，一向对他很尊重，这次便主动坐到他旁边，同他闲谈起来。开始是寒暄地问问他的健康状况，后来就谈起当前的运动来了。交谈中我发现他对运动也是很理解的，他说他把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地看了几遍，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。我当时也是这个想法，但是在那种情况下，也不便明确地表示支持他，当然也不愿说不同意他的意见，只说自己还没有认真看那张大字报，打算回去再找来好好读它几遍，看看到底有什么意义。

“八一八”检阅红卫兵以后，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便一哄而起。那些年轻娃娃们，纷纷“杀”向社会，大破“四旧”，大立“四新”，横扫一切“牛鬼蛇神”。中联部也出现了这样一批“革命小将”，他们到处抄家查“四旧”，结果将李初梨同志搜集的古董也当“四旧”抄了出来，一车一车拉走没收。后来他们听说康生也爱搜集古董，那不全是“四旧”，才退还给了李初梨同志。当时“小将”们劲头很大，唐明照同志由于长期在国外工作，存有一些西服，也被他们连箱子抄去了。可是他们头脑太热了，破“四旧”竟破到了王力家里，王力的妻子自恃家里有那么个“中央文革小组”要员，对红卫兵们十分骄横，把自己的高跟鞋扔到他们面前，将他们不客气地赶走，结果闹起了纠纷，惹得中央领导人都知道并过问了这事。其实这是他



们“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”。

在这股“革命”热潮中，我家里的孩子们也被发动起来了，他们分别参加了所在学校的红卫兵组织，有的还成为小头头。只是他们一开始就分了派，经常为一些“不同观点”争论不休，回到家里也不断谈论和辩论他们遇到的各种问题，有时还将他们各自的“战友”领回家来，一起讨论他们所关心的“国家大事”，弄得我家里经常十分热闹。我由于尚未直接参加运动，正好从他们那里得知不少情况和动向，也感受到一些青年人的热情。所以有时也很有兴味地听听他们的交谈和讨论。那时他们并没有搞什么打砸抢活动，只是真正地要革命，虔诚地响应着毛主席的伟大号召。其实对当时这场革命，到底怎么革法，别说是他们，连我也闹不太清楚。我们都从不同的地位，以不同的方式，被卷进了运动之中。我在中央的会议上，谈了自己及家中的情况，被编进了会议简报，竟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，他在10月间举行的中央汇报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，针对当时有的领导干部不敢接触红卫兵的情况，以我为正面例子讲道：“伍修权有四个孩子，分为四派，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，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，接触多了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，觉得他们很可爱。”他认为这是我联系群众的一种有效方式。这件事以后在全党也传开了。其实它恰恰反映了我对“文化大革命”最初的认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形势发展，很快超出了我们的预料，全国各地，所有部门，无一不漏地被卷入了运动之中，中联部当然也不是桃花源。康生早就插手部里的工作和运动，又将他的得意门徒王力从部里提拔到“中央文革小组”，因此中联部的运动一开始就受到他们的操纵和干扰。运动开始以后，按照《十六条》规定，部里也成立了“文化革命委员会”，作为领导运动的权力机构。我们这样的“当权派”，不是被排除在外，



就是被当做“监督使用”的对象，不仅不能干预部里的运动，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支配了。

中联部较早被拉出来当“靶子”的部领导干部是许立同志。他是分管外国党培训干部教学工作的副部长，是一位勤恳忠实的老同志。他的所谓“罪行”有这样一条：有次讲课时他偶然提到，苏联哲学家们的著作，都是一部又一部大厚本子，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，只有一二本小册子。就这么很平常的一句话，加上别的被歪曲夸张了的事，经过无限上纲全成了他“反对毛泽东思想”的“滔天罪行”。可是许立同志颇有股倔劲，随人怎么批他总是不认错，被认为“顽固抗拒”，打成了“三反分子”，斗得他很苦。他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，后来被赶到“干校”去改造，还被迫干掏厕所等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，最后终于被折磨病了，在缺乏医疗的情况下十分悲惨地被迫害至死。

当时我还没有被批斗，部里的运动是在康生、王力之流的操纵下，我们有意见也不被人理睬。就在“造反分子”们狠斗许立等同志时，我针对他们对同志搞“残酷斗争，无情打击”的做法，反复强调《十六条》中的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”，要求“造反派”们“君子动口不动手”。在一次会议上，我说许立同志“人家六十多岁了，又有高血压，请同志们还是要照顾这一点。再过三十年以后，你们也六十岁了，如果那时你们也遇到同样的情况，就会觉得应该怎么办了”。我原想提醒和告诫一下“造反派”们不要搞得太过分，谁知反而被他们抓住，说我这是用宣扬“资产阶级人道主义”来反对“阶级斗争观念”，说我的讲话干扰了造反派的“革命热情”和“造反精神”。这样，我自己也成了一个被批判的靶子。后来眼看着一些同志受迫害而无能为力，至今想起还觉心中沉重。

当时运动的口号是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，康生之流对中



联部只斗争了许立等几个同志，当然是很不满足的。6月中，他带着王力几次来到中联部，看了部里的大字报，亲自向部里干部做了“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”，生气地批评中联部运动的方向不对头。说“毛泽东思想还没进中联部的门”，“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”，还指着大字报道：“他们写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他们没有抓住大方向。你们为什么不集中火力批判‘三和一少’？这才是大方向！”他说中联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重点，应该是批判斗争王稼祥，他是提出“三和一少”的代表人物，应该将他批倒批臭！他诬蔑王稼祥同志是“定时炸弹”，说“中联部过去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部，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”，还大肆攻击彭真等同志，同时又心怀鬼胎地说他自己不是定时炸弹。他说：“我有信心不成为定时炸弹，我要是炸弹，就去炸美帝，炸陆定一，炸彭真，炸罗瑞卿。”

康生亲自出马发出号令，王力身先士卒闻风而动，根据康生的意旨，贴出大字报，将矛头直指王稼祥同志，直接煽动群众批判所谓“三和一少”的“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”。王力还别有用心地提出要追查什么王稼祥的“复辟活动”，并且要“穷追到底”。原来在王稼祥同志提出被称为“三和一少”的建议被否定后，他在中国联部的领导职权就被停止了，他请求中央另外给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，后来由周恩来同志批准，要他继续进行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。为此，他要求中联部派几个人协助他进行并提供有关材料。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，可是却被康生、王力之流说成是有人支持王稼祥搞“复辟”，要加以“追查”，将矛头实际上指向了周恩来同志。中联部的同志都知道王力的老底，50年代后期，他曾参加我国出席世界“和大”的代表团，团长是作家茅盾，党内则由他负责。在他同外国负责人的谈话中，也曾大念和平经，出力地散布和平幻想。可是此时，他竟成了反对“三和一少”的斗士，并且对王稼祥同志

进行了恶毒的诬陷。

正是在康生和王力的直接煽动和策划下，中联部的“造反派”揪斗了王稼祥同志，不仅在中联部机关内贴满了攻击和诬陷他的大字报，还将大字报和大标语贴到他的住处。我也看了一些大字报，其中有的简直令人啼笑皆非。如有人“揭发”他在中联部造什么“宫殿”，其实事实很简单，中联部因工作需要计划新建一座办公楼，预算经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批准，由我和有关的同志审定了设计图纸，在研究时曾经提出，为了工作方便，拟将部的领导同志和办公室主任等的办公地点设在二楼，开间也略为宽敞一些，以适应开会和外事活动的需要，许多机关也都是这样做的。可是有人却将此事夸大为造“宫殿”，此事不仅根本算不得什么“罪行”，并且也与王稼祥同志无关，“造反派”们完全是信口胡说，乱加罪名。

一般的人这样胡说倒也罢了，问题是有的负责干部说话办事也很不负责。所谓“三和一少”问题，其实既不是王稼祥同志偶然提出的，也不能算做是他一个人提出的。当时稼祥同志根据国内外形势，考虑了一些外交上使我国尽早摆脱困境的方法，他将自己的想法向党委提出，一一征求了几位部的领导同志的意见，大家一致认为他的意见是合理并且可行的，便由党委决定，作为一个外交政策的建议提交给中央和国务院。为了表示郑重，参加讨论并表示同意这一建议的负责同志，都在上送的报告上一一签上了名字。记得我是第一个签名的，只是我按照自己一向的习惯，虽然在时间上我是第一个签名，却把自己的名字签在靠后的地方，因此在报告的签名顺序上我并不在最前面。这个报告上送以后，我一直认为这个建议在政治上是合理的，在组织上也是合法的，我们都应对这一报告负有责任，而不应视做是王稼祥同志的个人建议。可是，这一建议并未被中央接受，并且受到了批评。康生早就嫉恨王稼祥同志，



连忙利用这一问题大肆攻击他，将这一正确建议说成是“三和一少”的“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”，以后又上纲为“三降一灭”路线，成了王稼祥同志的一条罪名。面对这些情况，一开始我就提出，所谓“三和一少”，我也有份，我是同意这个建议的，并曾在上送的报告上第一个签名，如果是错误的我也有责任，我可以和王稼祥同志一起去做检讨。我这样说了，也准备这样去做。可是有的同志却不然，他明明参加讨论并同意了那个建议，报告上也有他的大名，可是一见这建议受到批评，他却不肯认账了，硬说自己早就反对这个建议，也积极地批判起“三和一少”来。当有人揭露他曾支持过“三和一少”，康生就忙来保护他，说他是“首先揭露和反对‘三和一少’的人”。他这样做倒是同王稼祥同志划清了界限，可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的良好品德也随之失去了。

中联部的“造反派”在康生、王力的煽动指使下，对王稼祥同志进行了连续的围攻揪斗，他几次被架到中联部接受批判，批斗时又挂黑牌又坐“喷气式”，使他从精神到身体上都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摧残折磨。稼祥同志在战争时期负过重伤，一直身体不好，建国以后长期带病工作，当然很难承受这样的打击。可是那帮“造反派”斗了他还不够，连他的夫人朱仲丽同志也被拉到中联部来批斗，由于找不到她什么大问题，就抓了些对司机、炊事员的态度问题来无限上纲，攻击她如何“反动”等等。只因后来有人说这样斗了朱仲丽，反而便宜了王稼祥，是放过了主要目标，这才暂时放弃了她，又集中火力去攻击王稼祥同志。

王稼祥同志被斗的情况被中央知道了，有次我到中央参加一个会议，休息时周恩来同志找到我，告诉我说：“毛主席有过指示，王稼祥同志是有过功劳的人，现在身体不好，不要揪斗。把人弄死了，只有损失，没有好处。”周恩来又对我说：